

来源国视角下的国际旅游对 FDI 发展影响分析 ——以美国为案例地

杨莹莹, 陈 瑛

(陕西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文章选取 2000–2015 年 10 个国家对美国旅游和 FDI 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定量分析国际旅游对 FDI 的影响,并提出借鉴启示。研究发现:(1)国际旅游对 FDI 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作为控制变量的人均 GDP、GDP 总量、实际汇率、两国对外贸易总额、反倾销案件数、政治风险指数均对 FDI 产生影响,但影响效果不同;(3)旅游规模与各控制变量交互均可对 FDI 产生增强影响;(4)旅游规模与部分控制变量在 FDI 的地理分布影响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关键词:国际旅游 FDI 固定效应模型 地理探测器 美国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9)10-0076-08

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旅游国际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FDI)和国际旅游增长强劲,二者作为典型的经济外交和人文外交方式^[1],对宣传国家形象^[2-3]、提升国家软实力^[4-5]贡献着重要力量。商业发展史表明,商人经商的同时伴随着旅游行为,旅游和经济活动紧密相连^[6]。就流动方式而言,国际旅游中的消费行为是客源国对目的地的“直接投资”,FDI 是资金的“国际旅游”。目前有学者提出,应当通过国际旅游带动 FDI 的发展^[7-8],因此厘清二者的关系,符合二者当下的发展态势。

自旅游和 FDI 的关系这一学术话题被予以关注后,二者如何互动的讨论便不断展开。大部分学者倾向于 FDI 的发展可以积极影响旅游的发展:一方面,对旅游业的直接投资,可以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进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9-10];另一方面,对所有行业的投资可以提供安全、透明的运营环境,从而降低旅游企业的风险预期^[11]。Samimi^[9]、Selvanathan^[12]、Tang^[13]、万广华^[10]、蒋才芳^[14]等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测算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然而旅游的发展是否可以带动 FDI?对于这一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旅游行业的发展对 FDI 的带动作用^[15-16];(2)商务旅游对 FDI 的带动作用^[6,17-19]。但从旅游规模本身出发探讨旅游促进 FDI 发展的文献则较为少见。并且,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基本上都是单因素对单因素的分析,以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较为多见^[9,11,20],在考虑了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进行的实证研究则尚未展开;从研究现状上来讲,主要为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还存在拓展空间。

收稿日期 2019-08-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671118)

作者简介 杨莹莹,女,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国际旅游发展;陈瑛,女,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地理及 FDI 研究(通讯作者)。

本研究选取美国作为案例区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首先,美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发达的经济体,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 FDI 的首选东道国。2016 年,中国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达 456 亿美元,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国家,又是全球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市场。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与携程联合发布的《2017 年中国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显示,2017 年度美国位列“最受我国游客欢迎目的地国家”第 8 名(前 7 名皆为亚洲国家)。再者,从数据来源上讲,世界各类数据库、美国各政府部门等关于美国的数据统计相对完善且具有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可获得性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

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 FDI 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问题。现有文献既有从企业微观层面的分析,也有从国家宏观层面的分析,其中国家层面还可以分为从东道国和母国两个不同角度的探讨。本文试图从投资母国的角度,在总结前人研究得出的影响 FDI 的因素基础上,引入旅游规模这一变量,旨在解决旅游在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情况下如何影响 FDI 变化的问题。以期对我国发展 FDI 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同时丰富美国经济地理的研究内容。

1. 入境旅游影响 FDI 吸收的理论分析

国际旅游促进 FDI 发展的案例并非无迹可寻。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便通过出境旅游的发展,加大了对对外投资的范围和速度^[7]。按照美国国家旅游局关于入境旅游规模的统计口径,入境旅游者指的是在美国逗留时间 24 小时以上且不超过 1 年的游客,旅行目的包括度假、探亲访友、教育、商业活动、会议、医疗、宗教等。本研究按照旅游动机将入境旅游者分为“商务旅游者”和“非商务旅游者”,依此作为逻辑框架,推演国际旅游规模影响 FDI 吸收的基本路径。

1.1 商务旅游者: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指的是交易中的市场参与者之间所具有的信息资源的分布,表现为不均衡的非对称状态^[21]。这种现象的形成,从主观上看,是各经济个体在获取信息能力上存在非对称性;从客观上看,是由于社会分工导致某领域的专业知识只有从业者具备掌握信息的条件,因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活动参与者信息失衡的现象。FDI 是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大尺度的地理距离必然会对投资双方交流产生更多阻碍,进而导致信息不对称。FDI 作为一项复杂的跨国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信息,要比书籍、政府报告、行业报告等出版物所提供的信息更为详尽、复杂^[15],而且一些隐性信息,是高度个性化且难以程式化的,类似于直觉、预感、主观感受等,难以直接通过文字或数字表达^[22]。为了最大程度消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消极影响,作为投资者,可以通过商务旅游这种方式,将对东道国的文化与制度学习融入日常休闲和在场的考察活动中,也可以以派出诸如经济分析师、行业分析师等进行调研的方式,获取更多的有关当地社会文化环境、政策变化及行业形式方面的知识与信息,以提高市场信息效率^[23]。用母国的文化本底来切实“体测”东道国的文化距离,进而更精准地收集有效信息,旅游交流越频繁,在场的、具身的感受越丰富、所获取的信息更为全面系统,继而能够成为促成海外投资的关键因素。

1.2 非商务旅游者:关注和兴趣假设

关注和兴趣假设由孙根年^[24-25]在其旅贸互动的相关论文中提出,意指国家间的货物贸易会引发两国居民的关注和兴趣,进而激发旅游动机。本文借用该假设的思路,展开逻辑如下:旅游信息来源包含商业来源和非商业来源两种形式^[26],其中,最为有效的旅游信息传递效果是来自人际传播^[27]。通过出境旅游,旅游者可以实时观察到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资源禀赋、思想文化、法律法规等,进而通过旅游式学习获取知识,拓展国际视野^[28]。旅游者返回本国后,又将感知到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以口头或文字方式在本国进行传播,尤其在目前互联网发展十分发达的环境下,个人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各类旅游网站迅速地将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文字化和可视化呈现。大量的目的地资讯展现会诱发潜在投资者的关注和投资兴趣,潜在投资者进而通过商务旅游的形式对东道国进行考察,进而促进 FDI 活动有效进行。

2. 研究方法 with 指标体系

2.1 研究方法

2.1.1 个体效应模型

本文选取线性面板数据模型作为研究工具。面板数据最基本的形式是个体效应模型,如公式(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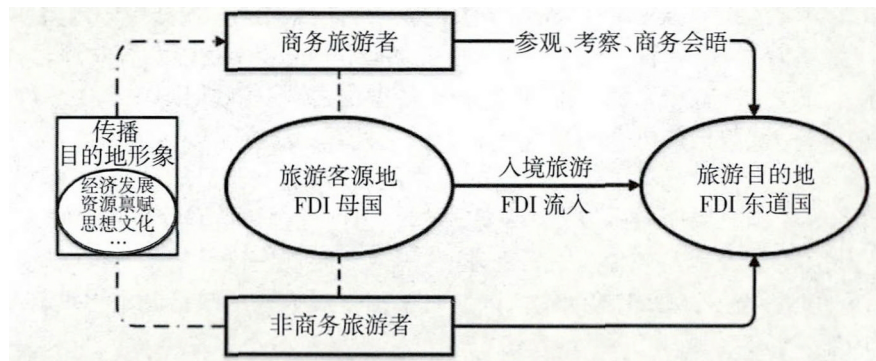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旅游促进FDI发展理论模型

Fig.1 International tourism promoting FDI development theory model

$$y_{it} = \sum_{k=1}^K \beta_k x_{kit} + u_{it} \quad (1)$$

其中 $i=1, 2, \dots, N$ 表示 N 个个体 $t=1, 2, \dots, T$ 表示已知的 T 个时点。 y_{it} 是被解释变量对个体 i 在 t 时的观测值; x_{kit} 是第 k 个非随机变量对于个体 i 在 t 时的观测值 β_k 是待估计的参数 u_{it} 是随机误差项。

运用个体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分析时,依照 u_{it} 是否与解释变量 x_{it} 存在相关性,产生了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前者假定 u_{it} 是完全随机的,与 x_{it} 无关,即所有解释变量都是外生的;后者假定存在相关性,即该模型允许内生的解释变量。对于随机效应模型来说,如果被忽略的或不可测的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将会导致 OLS 偏误,而固定效应模型可以通过对每个横截面单位引入一个虚拟变量来克服此问题。在实际的面板数据分析时,究竟是选取随机效应模型或者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利用 Hausman 检验来检测过度的约束条件,进而进行模型选取^[29]。

如果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效应不随个体和时间变化(如民族、性别、地理距离等),并且针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变量信息不够完整时,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解的截距项来描述这些缺失的确定性信息。固定效应模型分为 3 个类型,即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和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具体选取需要通过构造 Chow 检验 F 统计量来进行。

本文选取个体效应模型用以定量测度旅游规模和其他控制变量共同作用下对 FDI 的影响大小。

2.1.2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以空间自相关为理论基础,是探测空间分异性及其背后驱动力的统计学方法^[30]。该方法认为,如果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能够产生影响,则二者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31]。地理探测器主要包含因子分析、交互探测、生态探测等分析工具。

交互探测用以定量分析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空间分异的作用关系,即两因素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强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其表达式为^[30, 32]:设自变量 X_1 的驱动力为 P_1 , X_2 的驱动力为 P_2 。若 $P(X_1 \cap X_2) < \min(P_1, P_2)$, 则自变量 X_1 和 X_2 交互后单因子非线性减弱;若 $P(X_1 \cap X_2) > \max(P_1, P_2)$, 则自变量 X_1 和 X_2 交互后双线性增强;若 $P(X_1 \cap X_2) > P_1 + P_2$, 则自变量 X_1 和 X_2 交互后非线性增强;若 $P(X_1 \cap X_2) = P_1 + P_2$, 则自变量 X_1 和 X_2 相互独立。

生态探测用以比较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空间分异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 F 统计量来衡量,其表达式为^[30, 33]:

$$F = \frac{N_1(N_2 - 1)SSW(N_1)}{N_2(N_1 - 1)SSW(N_2)} \quad (2)$$

$$SSW(X_1) = \sum_{h=1}^{L_1} N_h \sigma_h^2, \quad SSW(X_2) = \sum_{h=1}^{L_2} N_h \sigma_h^2,$$

其中 N_1 和 N_2 分别代表两个自变量 X_1 和 X_2 的样本量, $SSW(X_1)$ 和 $SSW(X_2)$ 分别代表两个自变量形成分层的层内方差之和, L_1 和 L_2 分别为两个自变量的分层数目。零假设为 $H_0: SSW(X_1) = SSW(X_2)$, 如果在 $\alpha =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则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空间分异影响存在差异。

本文主要运用交互探测和生态探测来分析旅游规模与其他控制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效果,以及旅游规模与各控制变量对 FDI 的空间分布影响是否存在分异。

2.2 指标选取与理论说明

本研究从国家层面出发来选取控制变量。虽然 FDI 的行为主体是企业自身,某些宏观因素并不直接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但是宏观因素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规模、生产成本等微观因素进而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间接影响^[34]。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从基本经济状况、国际贸易、政治因素三个角度,选取人均 GDP、GDP 总量、汇率、两国贸易总额、反倾销案件数、政治风险指数作为控制变量,选取依据及预期影响见表 1。

表1 控制变量选取与理论说明

Tab. 1 Control variable selec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控制变量	理论说明	影响预测
经济因素	人均 GDP	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垂直型投资 ^[35]	+
	GDP 总量	一个经济总量大国要比一个经济总量小国更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 ^[17]	+
	汇率	汇率代表着本国金融状况对 FDI 的影响,但分析结果未达成共识 ^[36-37]	-
贸易因素	双方贸易总额	贸易活动的扩大代表贸易开放度的提升,使得国内企业能够获得国外的市场知识与组织海外业务相关的技能,因此有能力在国外开展业务 ^[38-39]	+
	反倾销案件数	根据补偿投资理论,东道国贸易壁垒的存在使得母国出口减少,为了补偿出口减少的损失,母国企业转而会向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 ^[40]	-
政治因素	政治风险指数	指数越大,代表一国政治情况越稳定。随着本国政治风险的增加,指数变小,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在海外投资分散或远离这种政治风险 ^[41-42]	-

2.3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变量类型和数据说明及来源如表 2。

表2 数据说明与数据来源

Tab. 2 Data description and data source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表达形式	单位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流量)	FDI	百万美元	美国商务部
解释变量	旅游规模	Tour	人次	美国国家旅游局
控制变量	人均 GDP	GDPPC	美元	世界银行
	GDP 总量	GDP	美元	世界银行
	汇率	ReER	-	世界银行
	双方贸易总额	Trade	百万美元	美国商务部
	反倾销案件数	AD	起	世界银行
	政治风险指数	PR	-	国家风险国际指南

对数据进行如下选择与处理:①鉴于数据之间存在量纲差异,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②GDP 总量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以 2010 年为基准测算的不变价美元数据;③各年人均 GDP 测算公式为:当年人均 GDP=当年 GDP 总量/当年人口数量。其中,当年 GDP 总量选取标准如②所述,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方统计;④汇率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以 2010 年为基期(100)的实际有效汇率;⑤FDI 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均采用 CPI 指数进行平减以获取实际值。

3.实证结果分析

为确保面板数据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本文选取了 10 个各项变量数据齐全的美国 FDI 来源国(分别为中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新加坡、英国)2000 年到 2015 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避免出现伪回归;其次,对数据进行 Hausman 检验和 F 检验,来确定模型类型和模型形式;最后,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入境旅游规模与吸收 FDI 之间的量化关系。

本文使用 *Eviews6.0* 完成数据检验与分析。

3.1 单位根检验

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要进行单位根检验,这是避免出现伪回归的前提条件。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有别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采用 *LLC*、*Breitung*、*Hadri*、*IPS* 和 *Fisher-ADF* 等检验方法。本文采用 *LLC* 和 *Fisher-ADF* 两种方法检验单位根存在情况,前者假设存在相同单位根,后者原假设存在不同单位根。

表3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

Tab. 3 Unit root test results

变量	FDI	Tour	GDPPC	GDP	ReER	Trade	AD	PR
类型	(C,T,ρ)	(C,T,ρ)	(C,T,ρ)	(C,T,ρ)	(C,T,ρ)	(C,T,ρ)	(C,T,ρ)	(C,T,ρ)
LLC	-1.550 (0.061)	-0.513 (0.304)	-2.114 (0.017)**	-4.347 (0.000)**	-0.768 (0.221)	-2.710 (0.003)**	-5.454 (0.000)**	-6.521 (0.000)**
Fisher-ADF	25.704 (0.176)	39.743 (0.005)**	30.335 (0.067)	33.468 (0.030)**	11.614 (0.929)	33.056 (0.033)	52.427 (0.000)**	49.347 (0.000)**
结论	不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平稳	不平稳	不平稳	平稳	平稳
类型	(C,T,1)	(C,T,1)	(C,T,1)	(C,T,1)	(C,T,1)	(C,T,1)	(C,T,1)	(C,T,1)
LLC	-10.027 (0.000)**	-0.619 (0.000)**	-3.372 (0.000)**	-6.472 (0.000)**	-4.147 (0.000)**	-8.553 (0.000)**	-4.150 (0.000)**	-8.300 (0.000)**
Fisher-ADF	92.018 (0.000)**	39.936 (0.005)**	38.765 (0.007)**	45.887 (0.001)**	42.780 (0.002)**	54.334 (0.000)**	71.810 (0.000)**	80.992 (0.000)**
结论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注:**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

LLC 检验和 *Fisher-ADF* 检验结果显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过一阶差分之后,所有变量都达到了平稳状态,因此可以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3.2 协整检验

因本文控制变量较多,因此选取卡奥(Kao)提出的基于残差的 *ADF* 检验法用以处理面板数据协整检验。该方法零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经检验 $ADF(t-Stat.)$ 值为 -4.528,相伴概率为 0.000,驳回原假设,认为该面板数据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3 Hausman 检验

Hausman 检验用来确定模型类型,即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做出选择。*Hausman* 检验其原假设与备择假设分别如下:

$$H_0: E(\varepsilon_{it}\alpha_i) = 0 \quad H_1: E(\varepsilon_{it}\alpha_i) \neq 0$$

经检验,卡方检验值为 23.357,相伴概率为 0.002,表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接受“固定效应模型有效”的备则假设。

3.4 模型设定检验

固定效应模型有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和时点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三种形式。当影响因素中存在并不随时间变化的推移而变化,但在各国家地区之间却存在显著差异的因素(如民族、气候等,本文中为地理距离)时,将回归模型设定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理^[43]。个体固定效应是指,从时间和个体上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影响均是相同的,而且除模型的解释变量之外,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其他所有(未包括在回归模型或不可观测的)确定性变量的效应只是虽个体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

在应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问题时,采用无约束模型和有约束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之比构造 *F* 统计量,以检验设定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合理性。*F* 检验的零假设为:

$$H_0: \lambda_1 = \lambda_2 = \lambda_3 = \dots = \lambda_{N-1} = 0$$

在零假设 H_0 下, *F* 值计算公式如下:

$$F_1 = \frac{(RRSS - URSS)/(N-1)}{URSS/(NT - N - K + 1)} \sim F(N-1, N(T-1) - K + 1). \quad (3)$$

其中, $RRSS$ 是有约束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URSS$ 是无约束模型的残差平方和, T 为时间序列最大长度, N 表示面板数据中含有 N 个个体, K 为解释变量个数。经计算, $F1=16.141 > F_{0.05}(9, 146)=1.658$ 。因此, 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 如果拒绝了 H_0 , 则将模型设定为个体固定效应, 其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y_{it} = \delta + \lambda_i + \sum_{k=2}^K \beta_k x_{it} + u_{it} \quad (4)$$

3.5 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进行分析, 并引入 $PCSE$ 法对模型进行修正,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4。模型调整后 $R^2=0.917$, $P(F-Stat.)=0.000$, 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和回归效果都比较好。

表4 吸收FDI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

Tab. 4 Model estimation result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检验	相伴概率
C	2.011	0.117	17.183	0.000
Tour	0.247	0.053	4.627	0.000
GDPPC	0.239	0.023	10.429	0.000
GDP	0.670	0.042	16.067	0.000
ReER	-0.070	0.012	-5.834	0.000
Tr	0.806	0.065	12.313	0.000
Ad	-0.091	0.006	-16.008	0.000
PR	-2.510	0.149	-16.844	0.000

从表 4 可以看出, 各变量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母国旅游规模、人均 GDP、GDP 总量、两国贸易量每增加 1 个单位, 分别带动流入美国的 FDI 增加 0.247、0.239、0.670、0.806 个单位; 实际汇率、反倾销案件数、政治风险指数每增加 1 个单位, 流入美国的 FDI 则减少 0.070、0.091、2.510 单位。已有文献研究中, 证实了地理距离^[17, 44]也能对 FDI 产生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在 Eviews 软件的测算中, 由于要考虑到奇异矩阵的问题, 不能直接加入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进行运算, 因此本文未将地理距离列入控制变量的范围。

3.6 交互作用和空间分异性分析

使用地理探测器中的交互探测和生态探测进行交互作用分析和空间分异显著性分析, 结果如表 5:

表5 旅游规模与各影响因素交互结果及空间分异

Tab. 5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scale and each control factor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交互项	交互探测值	交互结果	是否存在空间分异
Tour $\cap$ GDPPC	0.871	非线性增强	N
Tour $\cap$ GDP	0.886	非线性增强	N
Tour $\cap$ ReER	0.790	双线性增强	Y
Tour $\cap$ Trade	0.872	非线性增强	N
Tour $\cap$ AD	0.826	双线性增强	Y
Tour $\cap$ PR	0.917	双线性增强	Y

根据交互作用探测区结果, 旅游规模与其他各因素交互对 FDI 产生的影响, 均大于旅游规模本身对 FDI 产生的影响(0.488)。其中, 旅游规模与政治风险指数交互对 FDI 产生的影响最强(0.917), 紧接依次为: GDP、双方贸易总额、人均 GDP、反倾销数量、汇率。交互结果显示, 旅游规模与人均 GDP、GDP、双方贸易额交互呈双线性增强关系, 与实际汇率、反倾销案件数、政治风险指数交互呈非线性增强关系。

借助生态探测区分析结果可以得出, 旅游规模对 FDI 空间分布的影响, 与人均 GDP、GDP、双方贸易额对 FDI 空间分布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 与汇率、反倾销案件数、政治风险指数对 FDI 空间分布的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孙根年^[45]曾提出, 出境旅游的游客, 倾向于选择与本国有着密切经贸联系的国家或地区去旅游, 这可以解释旅游规模和两国贸易总额对 FDI 的空间分异为什么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 GDP 和人均 GDP 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该国家人民经济水平, 多项研究已表明, 客源国人均 GDP 和 GDP 的提高均可以促进出境旅游的发展^[46], 可论证人均 GDP、GDP 与旅游规模在 FDI 地理分布的影响上为什么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美国为研究区域,使用2000–2015年10个对美直接投资主要国家的数据构建面板模型,选取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了国际旅游对FDI发展的拉动作用,使用地理探测器测算了旅游规模与其他控制变量交互后对FDI产生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协整分析表明,旅游规模与FDI发展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前者对后者具有带动作用;(2)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表明,美国入境旅游规模每增加1个单位,带动FDI吸收量增加0.247个单位;(3)作为控制变量的人均GDP、GDP总量、实际汇率、两国对外贸易总额、反倾销案件数、政治风险指数均对FDI产生影响,但影响效果不同;(4)交互探测表明,旅游规模与其他控制变量产生的交互作用会增强对FDI的影响,其中与政治风险指数产生的交互作用最强;(5)生态探测表明,旅游规模与各控制变量对FDI的空间分布影响上明显不同。其中,与人均GDP、GDP、双方贸易总额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与反倾销案件数、汇率、政治风险指数存在显著性差异。

4.2 讨论

美国作为全球FDI和国际旅游发展的强国,两者的发展和带动路径均具有示范性。本文以美国为研究区域,得到如下启示:(1)从旅游目的地FDI东道国的角度,在注重旅游业发展自身效应外,要充分重视旅游业发展对国际投资的拉动效应。针对我国而言,应当继续大力发展入境旅游。我国入境旅游当前正处于从全面恢复转向持续增长的新阶段,市场整体趋稳向好,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潜在的旅游资源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入境旅游市场所需的产品与服务,基础设施和综合服务配套相对不足,对外宣传推广工作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等^[47]。为此,各地政府部门应增强市场营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旅游景点和产品,优化旅游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另外,鉴于旅游规模与其他因素可共同作用增强FDI的吸收,还应当注重建设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加强与主要投资国贸易往来,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与提升入境旅游品质一同来增加本国在FDI活动中的吸引力;(2)从旅游客源地FDI母国的角度,应注意到旅游式学习的意义。旅游式学习包括境外学习、参观考察等。根据全球化智库(CCG)和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中显示,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对东道国法律、市场环境了解欠缺、综合情况分析和研究调查不足,跨文化整合能力不够的问题。国际旅游过程中伴随着跨文化学习,“一手观察数据”对投资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投资者在进行旅游考察前,要明晰学习动机,动机越明确,越能获得与期望一致的学习体验与知识^[48],降低因了解不深入而引致的对外投资风险。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囿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的美国FDI东道国绝大部分都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仅有中国,这将在未来数据统计愈加全面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再者,本文在论证国际旅游流量可以影响FDI的理论基础上,选取美国作为案例地进行实证检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以后的研究中将选取更多的案例地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 [1] 苏长和,陈玉刚,刘鸿武,等.中国外交研究的新领域、新议程、新机遇[J].国际观察,2010(1):10–13.
- [2] 王宏禹,罗洋.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4(4):25–40.
- [3] 邹统钎,胡莹.旅游外交与国家形象传播[J].对外传播,2016(5):22–24.
- [4] 窦晓博.经济外交与中国软实力[J].学理论,2012,26(5):5–7.
- [5] 郭鲁芳,张素.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与软实力提升研究[J].旅游学刊,2008,23(12):18–22.
- [6] 包富华,陈瑛,孙根年.我国入境商务旅游与FDI的空间聚散及形成机制[J].经济管理,2015,37(12):124–134.
- [7] 戴学锋.论出境旅游在扩展中国国际影响力中的作用[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209(9):1–8.
- [8] 戴学锋.出境旅游应成为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J].旅游学刊,2011,26(8):6–7.
- [9] SAMIMI A J, SADEGHI 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J]. Institutions & Economics, 2013, 5(2): 59–68.
- [10] 万广华,汤树梅.外国直接投资与旅游业:来自中国的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2006(5):49–59.
- [11] KATIRCIOGLU S. The bounds test to the level relationship and causality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case of Turkey[J]. E A M Ekonomie A Management, 2011, 14(1): 6–13.

- [12] SELVANATHAN S, SELVANATHAN E A, VISWANATHAN B. Causality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ourism :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India.[J].*Tourism Analysis* 2012 46(4) :91-98.
- [13] TANG S, SELVANATHAN E A, SELVANATHAN 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ourism :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Tourism Economics* 2007 ,13(1) 25-39.
- [14] 蒋才芳 陈收.旅游外汇收入、FDI 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协整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0 , 24(4) : 78-83.
- [15] SANFORD D M J, DONG H P. Investment in familiar territory : tourism and new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Tourism Economics* , 2000 ,6(3) 205-219.
- [16] TISDELL C, WEN J. Investment in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 its scale , nature and policy issues for consideration.[J].*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0 2(2) :175-193.
- [17] DUNNING J H. Explaining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 in defence of the eclectic theory [J].*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Statistics* , 2010 41(4) 269-295.
- [18] DUNNING J H, MCQUEEN M. 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hotel industry[J].*Managerial&Decision Economics* , 2015 2(4) :197-210.
- [19] DUNNING J H, KUNDU S K.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hotel industry : some new findings from a field study [J].*Mir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5 35(2) :101-133.
- [20] 高明.中国入境旅游规模与“外国直接投资”依赖[J].*旅游论坛* 2011 04(1) :44-50.
- [21] 潘敏 金岩.信息不对称、股权制度安排与上市企业过度投资[J].*金融研究* , 2003 27(1) 36-45.
- [22] IKUJIRO NONAKA. 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 ,1994 5(1) :14-37.
- [23] 肖斌卿 彭毅 方立兵 等.上市公司调研对投资决策有用吗——基于分析师调研报告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 , 2017 , 20(1) : 119-131.
- [24] 赵多平 孙根年 苏建军 等.欧洲七国入境中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1985-2009 年的协整分析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J].*世界地理研究* , 2011 , 20(4) : 121-133.
- [25] 孙根年 周露.日韩东盟 8 国入境我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J].*人文地理* 2012 ,128(6) 87-94.
- [26] FODNESS D. AND MURRAY B. Tourist information search[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7 24(3) :5035-23.
- [27] 白凯.旅游者行为学[M].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2013.46.
- [28] 黄潇婷.出境旅游与国民素质——从回归旅游本质的视角认识出境旅游[J].*旅游学刊* 2011 26(7) 9-10.
- [29] 兰草.截面、面板数据分析与 STATA 应用[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0-13.
- [30] 王劲峰 徐成东.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J].*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
- [31] WANG J F , HU Y .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detection with GeogDetector[J].*Environmental Modelling & Software* , 2012 , 33(6) :114-115.
- [32] 赵多平 王翠婷 曹兰州.宁夏赴阿拉伯国家出境商务旅游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J].*人文地理* , 2017 , 158(6) : 146-153.
- [33] 梁巧霞 黄杰 谢霞 等.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天山北坡旅游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018 , 54(6) : 82-88.
- [34] 黄友星.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母国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 , 2011 , 188(4) : 136-140.
- [35] TANAKA 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ern Europe[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3 470(5) :681-93.
- [36] BLONIGEN B A. Firm-Specific Assets and the Link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3) :447-465.
- [37] BARRELL R , PAIN N.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 1996 , 78(2) 200-207.
- [38] SOO KHOON GOH , KOI NYEN WONG. Malaysia's outward FDI : The effects of market size and government policy[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 2011 33(3) :497-510.
- [39] BUCKLEY P J , CLEGG L J , CROSS A R.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99-518.
- [40] 张菡洛.反倾销对东道国 FDI 进入方式及流量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2006 , 23(11) : 78-86.
- [41] THOMAS D E , GROSSE R. Country-of-origin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n emerging market : the case of Mexico[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 2002 7(1) :59-79.
- [42] DAS K C. Home Country Determinants of Outward FDI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J].*SAGE Publications* , 2013 7(1) 93-116.
- [43] 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南开大学出版社 , 2008 : 22-28.
- [44] H.MIKAEL SANDBERG , JAMES L. SEALE JR , TIMOTHY G. TAYLOR. History , regionalism , and CARICOM trade : A gravity model analysi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2006 42(5) :795-811.
- [45] 孙根年 张毓.资源-区位-贸易三大因素对日本游客入境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J].*地理研究* 2011 30(6) :1032-1043.
- [46] 杨莹莹 陈瑛.我国出境旅游研究综述与展望[J].*资源开发与市场* , 2018 , 251(7) : 91-95 , 139.
- [47] 李创新.优化结构提升品质 促进入境旅游发展[N].*中国旅游报*. 2018-7-20.
- [48] 白长虹 王红玉.旅游式学习 理论回顾与研究议程[J].*南开管理评论* , 2018 21(2) :192-198+ 209.

[责任编辑 唐 鑫]